

晋侯墓地研究述评^[1]

(上)

□ 谢尧亭

晋侯墓地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被盗发现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后改称文博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先后进行了六次,对整个墓地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李伯谦指出:“晋侯墓地1992~2000年共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除车马坑和个别陪葬墓与祭祀坑外,基本上已揭露完毕。”^[2]由于发掘报告尚在整理,目前所有的研究都是依据简报、上海博物馆抢救回来的器物 and 墓地发掘者报道的相关材料而做出来的,尽管如此,由于晋侯墓地发现文物丰富,涉及范围较广,研究内容较多,而且“晋侯墓地是迄今所见保存状况最好、资料最为系统的一处周代诸侯墓地”^[3],因此研究论文比较多,数年前徐天进已经就晋侯墓地的发现和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述,并认为这是目前为止同时期、同规格的墓地中保存最完整、排列最清楚,而且也是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处^[4]。后来又有许多文章陆续发表,从研究晋侯墓地和晋文化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很有必要对晋侯墓地研究状况进行述要和简评,以推动相关的研究进程。

目前晋侯墓地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年代学研究(包括墓葬排序)及墓主的确定;关于晋国的迁都问题(包括始封地);晋侯墓地的器用制度(包括用鼎、用玉、两套编钟、叔矢方鼎、杨姑壶的研究和其他);西周公墓墓地制度问题;晋国早期历史文化的发展。

一、西周墓地的年代学研究

年代学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墓地发掘伊始,年代问题的讨论便开始了,墓葬的排序是相对年代研究的一部分。第一次发掘简报认为M1、M2年代相近,把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定在西周晚期,墓主应该是晋国诸侯一级的贵族,并指出这里是一处

晋国高级贵族的墓地,M1、M2很可能是夫妻异穴合葬墓^[5]。第二次发掘简报认为M9、M13年代最早,大致在西周中期的穆王前后,M6、M7年代晚于M9、M13,大约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恭懿之时,M8年代最晚,相当于西周宣王之世,从墓地排列情况来看,北赵晋侯墓地应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开始,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M8墓主范围限定在晋献侯和晋穆侯,其年代范围相当于周宣王之世,更具体地说,应在宣王十六年至四十三年间(前812-前785年)^[6]。第三次发掘简报认为M13是迄今发掘中年代最早的一座晋侯夫人墓(属西周中期早段)^[7]。第四次发掘简报认为M62、M63、M64三墓时代当为西周末年^[8]。第五次发掘简报推定M33的主人即为晋侯燹马,年代约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即孝夷之世,M91、M92的年代定在厉王前后,M93、M102的年代定在春秋初年,认为晋侯墓地起止年代大体是从西周中期(穆王前后)至春秋初年^[9]。孙华认为M9、M13的年代应该断定在穆、恭之际,M1、M2的时代不过夷、厉时期^[10]。卢连成认为M6、M7组墓葬的年代似乎略早于M9、M13组,它们应是世次相连的两代晋侯,M9、M13的年代不会早于穆王,很有可能是在共、懿之际,那么早于它的M6、M7组的年代大约也只能限定在穆、共之时了,M64、M62、M63的年代约在春秋初年,M8、M31的年代大约是在东周初年,M64组应略晚于M8组^[11]。曲沃县博物馆介绍了县公安局侦破文物案缴回文物有晋侯苏鼎2件及其他铜器^[12]。李伯谦认为晋侯墓地应即是从晋武侯开始至晋文侯止的八代晋侯的墓地,时代上起西周中期偏早,下迄春秋初年^[13]。黄锡全认为晋侯“对”器可能大部分出自M1和M2,但也可能部分出自M8,M8中的二晋侯名决不可能是一位晋侯,推定M9为武侯,M6“燹马”为成侯,M33“喜父”为厉侯,M91“对”为靖侯,M1“匭”为釐侯,M8“苏”为献侯,M64“邦父”为穆

侯 M93 为文侯^[14]。刘启益认为 M64 中出现的三个人名是祖孙三代,认为 M8 簋壶上的晋侯名为釐侯司徒, M1 为靖侯宜臼, M8 为穆侯, M64 为昭侯, M93 为孝侯。并认为西周至春秋初年,埋葬历代晋侯的不只北赵一处墓地,还应该另有墓地^[15]。孙华认为北赵晋侯墓地的年代范围应当从穆恭之际到平王时期,延续了近 200 年^[16]。李伯谦认为从晋侯墓地的年代范围、各组墓的排列顺序和铜器铭文的考释等方面综合研究,我们关于晋侯墓地八组晋侯及夫人墓墓主的推定是合乎情理的、正确的。证明《晋世家》关于晋国世系的记载可信和墓位安排上并未实行昭穆制度^[17]。朱凤翰认为 M13 墓主为晋姜,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早,约穆王时, M9 或可早到昭王晚期。M33、M32 组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 M91、M92 组年代在西周晚期偏早, M1、M2 组在西周晚期中叶, M8、M31 为西周晚期晚叶, M64 在公元前 793 年后, M62、M63 年代与之接近,其中 M62 的匜近于春秋早期形制, M93、M102 组年代当已进入春秋早期。M9 为成侯, M6 为厉侯, M33“喜父”失载(“焚马”可能属 M6 或 M33), M91“对”为靖侯, M1 匜为釐侯, M8 苏为献侯, M64 邦父为穆侯, M93 为文侯^[18]。徐天进认为西周至春秋初年晋国墓葬分四期 7 段,第一期含 1、2 段, 1 段典型墓葬为 M6054、M6069、M6121、M6210 等,相当于唐叔虞时,周成王和康王世。2 段典型墓葬为 M6081、M6130、M6131、M6214 等,相当于晋侯燹父时,周昭王世。第二期含 3、4 段, 3 段典型墓葬为 M9、M13、M6、M7、M6308、M6384 等,相当于晋武侯、成侯时,周穆恭懿孝王世。4 段典型墓葬为 M32、M33、M6434、M7092、M7113、M7176 等,相当于晋厉侯时,周夷王世。第三期含 5、6 段, 5 段典型墓葬为 M91、M92、M1、M2 等,相当于晋靖侯、釐侯时,周厉王(共和)世。6 段典型墓葬为 M8、M31、M64、M62、M63 等,相当于晋献侯、穆侯时,周宣王世。第四期含 7 段, 7 段典型墓葬为 M93、M102,相当于晋文侯时,周幽王、平王世^[19]。杨建军认为 M93、M102 时代为春秋早期早段^[20]。第五次发掘简报将各墓按照年代早晚排定如下: M9、M13→M6、M7→M32、M33→M91、M92→M1、M2→M8、M31→M62、M63、M64→M93、M102,并认为八组墓之间的年代衔接紧密,其间似无空缺^[21]。第六次发掘简报认为 M114、M113 组和先前排第一位的 M9、M13 组墓最接近,它们应该是目前晋侯墓地所见最早的两组墓葬,其时代相当于西周早中期之际^[22]。朱凤翰认为

M114 早于 M9,同时认为 M114 早于 M113^[23]。张懋镛认为 M114 可早到西周早期, M102 处两周之际^[24]。孙庆伟将 M114 的年代推定在昭王时期,夫人墓 M113 的年代推定在穆王前期,它们的时代当在 M9、M13 组之前^[25]。李伯谦认为推定 M8 为已进入东周的晋文侯仇之墓是缺乏根据的^[26]。王占奎认为晋世系与周王世的比对结果是,唐叔虞(成王)—燹父(康王、昭王?)—武侯(昭王?、穆王)—成侯、厉侯、靖侯(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釐侯(共和)—献侯、穆侯、殇叔(宣王)—文侯(幽王),晋武侯墓(M9)的年代大致在周穆王之世。关于晋世系有遗漏的猜测是不必要的,这个疑虑可以消除了^[27]。李伯谦认为眉县杨家村 27 件铜器除孟外都是宣王时的标准器,晋侯墓地 M1、M8、M64 三座墓俱在宣王时期, M1 早于 M8, M8 早于 M64,晋侯墓地的晋侯墓为燹父至文侯的九代晋侯,与《史记·周本纪》从康王至平王 11 王 10 世的对应可谓若合符节。晋侯墓地并非按昭穆制度排列,其涵盖的年代范围,最早一组 M114、M113 不早于西周早期偏晚,下限在西周早中期之际,最晚一组 M93、M102 当已进入东周,属春秋早期^[28]。程平山认为唐叔虞当周成王之世,晋侯燹当周康王之世,晋武侯当周昭王之世,晋成侯当周穆王之世,卒于穆王之世,晋厉侯当周共王之世,当周穆王、共王之时,卒于懿王六年,晋靖侯元年当懿王七年,懿王二十四年卒,在位 18 年,晋釐侯元年当懿王二十五年,厉王十六年卒,在位 48 年,晋献侯元年当周厉王十七年,宣王十六年卒,在位 51 年,晋穆侯元年当周宣王十七年,宣王四十三年卒,在位 27 年,伐条在周宣王三十六年(晋穆侯二十年),伐千亩在周宣王三十九年(晋穆侯二十三年),晋殇叔元年当周宣王四十四年,周幽王元年卒,在位 4 年,晋文侯元年当周幽王二年,周平王二十五年卒,在位 35 年^[29]。宋玲平认为晋侯墓的年代从西周早期晚段到春秋早期^[30]。

绝对年代的研究涉及到具体王年和西历年代。孙华认为晋献侯卒于周宣王二十九年(公元前 799 年),其墓也应当在此年或其后一年^[31]。仇士华、张长寿认为 M8 的碳 14 年代为距今 2625 ± 22 年,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 808 ± 8 年,晋侯苏就是晋献侯,其卒年的记载是可信的^[32]。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研究结果是: M9 人骨样品的年代为公元前 935—855 年, M13 人骨为公元前 930—公元前 855 年, M6、M7 为公元前 910—公元前 845 年, M33 陪葬墓 M108 人

骨为公元前 880—公元前 831 年, M91、M92 为公元前 860—公元前 816 年, M1、M2 为公元前 834—公元前 804 年, M8、M31 组 M8 木炭为公元前 814—公元前 796 年, M31 夫人陪葬墓 M39 人骨为公元前 814—公元前 797 年, M8 祭祀 M11 为公元前 810—公元前 794 年, M64 人骨为公元前 804—公元前 789 年, M64 祭祀 M87 为公元前 800—公元前 785 年, M64 木炭为公元前 800—公元前 784 年。M93 祭祀为公元前 789—公元前 768 年^[33]。李伯谦公布 M114 人骨为公元前 1000—公元前 925 年, M113 为公元前 1020—公元前 930 年, 认为无论是考古分期, 抑或碳 14 年代测定, 晋侯墓地的年代上限不能早于西周早期, 下限也不会晚于春秋早期^[34]。任伟认为晋侯墓地的时代范围限定在西周早期昭王之时至春秋初年为宜^[35]。

关于墓地的墓葬排列顺序及其墓主的归属问题属于墓地研究的基本内容。李朝远将晋侯簋、壶上的晋侯名释读为仇, 认为 M8 的墓主很可能是晋文侯仇^[36]。邹衡认为, 晋厉侯福夫妻墓即 1992 年 4-6 月清理的 M1 与 M2, 从陶器看, 此墓之时代应在西周中晚期, 与晋厉侯年代相合。晋侯苏墓属西周晚期偏晚, 晋侯苏决不可能是晋献侯, 当为晋穆侯无疑, 晋侯 X 非晋文侯莫属, 同时认为 M9、M6、M33 应是晋侯夔父、武侯、成侯祖孙三代的墓葬, “今晋侯夔父墓既然在天马一曲村遗址内, 唐叔虞墓亦应在此^[37]”。张颢认为 M8 发现的晋侯苏鼎, 可能是晋国第八代君主献侯所作之器, 考证 M8 铜簋、壶上的晋侯即晋文侯的名字匹, 同时认为至于 M8 是否确属晋文侯本人之墓,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38]。裘锡圭认为定晋侯苏为晋献侯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应是《史记》所记的西周时代晋侯的年代, M8 铜簋、壶上的晋侯名应是斯字, 晋献侯名苏, 字斯, 晋侯对的“对”也是字而不是名, M1 的墓主晋侯“对”似以是厉侯的可能性为大, “邦父”有可能就是晋穆侯的字^[39]。刘绪、罗新对当时晋侯墓地已发掘墓葬的排序是 M9、M13 → M6、M7 → M33、M32 → M1、M2 → M8、M31 → M64、M62、M63, 并认为最早的一组相当于西周昭穆之时, 最晚的一组相当于两周之际^[40]。第五次发掘简报根据《史记·晋世家》记载的晋侯世次认为可将唐叔虞和晋侯夔父两代晋侯排除在该墓地之外, 殇叔也不可能入此“兆域”, 所剩八代晋侯恰好可与八组大墓相对应, 又以 M8 出土的“晋侯苏”铭与《世本》所记晋献侯名相一致为支点, 推断其余各墓

对应的晋侯及其夫人, 把各墓墓主和《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世系对应排列如下: M9 : ? 武侯 (宁族)、M7 : ? 成侯 (服人)、M33 (夔父) 厉侯 (福)、M91 (喜父) 靖侯 (宜臼)、M1 (对) 釐侯 (司徒)、M8 (苏) 献侯 (籍、苏)、M64 (邦父) 穆侯 (费王)、M93 : ? 文侯 (仇)。并对第四次发掘简报认为的 M62、M63、M64 是一组一夫二妻的并穴合葬墓的观点进行了修正, 认为 M102 墓主有可能是妾属之类, 而不是“正夫人”, 而 M63 的墓主则很有可能是 M93 墓主之夫人^[41]。朱凤翰认为 M8 有可能已进入春秋早期, M1 约在西周晚期之初, M2 似略早, M64 似早于 M62、M63, M64 墓主晋侯或可能在靖侯至献侯间^[42]。李学勤认为裘锡圭释 M8 的晋侯为一名一字是正确的, “司徒”与“对”或亦一名一字, 晋叔家父很可能是殇叔, M102 为殇叔之妻, 第一组 9 号墓为武侯, 第二组 6 号墓为成侯, 第三组 33 号墓为厉侯, 第四组 91 号墓为靖侯, 第五组 1 号墓为釐侯, 第六组 8 号墓为献侯, 第七组 64 号墓为穆侯, 第八组 93 号墓为殇叔。北赵晋侯墓地所出金文所反映的晋世系, 和殷墟甲骨文中的商世系一样, 证明了“《世本》、《史记》之为实录”^[43]。孙华同意裘锡圭将 M1 铜器铭文释“对”的意见, 他更倾向于墓主为晋靖侯宜臼, 他怀疑 M8 铜簋、壶上的晋侯为釐侯司徒^[44]。卢连成认为 M9 或 M7 不可能是晋侯夔父的墓葬, M8 可能属于晋文侯仇的墓葬, 认为 8 组大墓应分东西两区, 东区 6 组墓葬早晚排列为 M6、M7 → M9、M13 → M32、M33 → M91、M92 → M1、M2 → M8、M31, 西区两组墓葬暂时不能排定, 但肯定晚于东区 6 组墓葬, 东区 6 组墓葬起始于穆王之后, 迄止于周平王时, 由《史记·晋世家》推知, M6、M7 组为晋厉侯及其夫人墓葬, M9、M13 组为晋靖侯及其夫人墓葬, M33、M32 组为晋釐侯及其夫人墓葬, M91、M92 组为晋献侯及其夫人墓葬, M1、M2 组为晋穆侯及其夫人墓葬, M8、M31 组为晋文侯及其夫人墓葬, 目前尚不能确定唐叔虞、晋侯夔父、晋武侯、晋成侯四代晋侯的墓葬也在天马一曲村墓地, 第一代晋侯唐叔虞很有可能归葬于周, 夔父以后三代晋侯可能另有兆域^[45]。李裕民认为 M8 铜簋、壶上的晋侯名字释毗或颀, 是晋穆侯之名^[46]。李学勤认为 M9 为武侯, M93 为殇叔 (晋叔家父), 其余同第五次发掘简报, 认为苏、籍古音相通^[47]。孙华同意并论证了第二次发掘简报和裘锡圭将晋侯苏推定为晋献侯的意见, 不同意邹衡定为晋穆侯, 确定 M8 的墓主就是晋献侯苏, 将 M8 铜簋、壶上的晋侯铭文推测为晋

釐侯的名或字^[48]。冯时认为 M8 铜簋、壶上的晋侯名字以释“匹”为是,晋侯“匹”与晋侯“对”当是一人,晋釐侯有“司徒”和“对”两个名,认为张颌指晋侯“匹”为晋文侯“仇”的可能性不大, M1 为晋侯对之墓, M8 为晋侯苏之墓, M64 为晋穆侯之墓^[49]。林圣杰认为 M8 铜簋、壶上的晋侯名字当从李朝远的隶定,读为咎,器主为晋靖侯宜臼,宜臼为晋靖侯名,喜父为字,器铭当为臼之借字^[50]。李伯谦认为第五次发掘《简报》的推断是可以成立的^[51]。张长寿认为晋叔家父不是晋侯,晋侯墓地中并非都是父子相继,也有兄终弟及的, M64 和 M93 有可能是晋穆侯和殇叔,也有可能是晋文侯和桓叔, M8 出土铜簋上的晋侯名不是晋侯苏,晋侯苏即晋献侯,他给出的可能排序是 M9、M13→M1、M2→M6、M7→M8、M31→M32、M33→M91、M92→M62、M63、M64→M93、M102^[52]。李伯谦同意第五次发掘简报的排序和墓主推定的意见^[53]。谢尧亭认为 M8 为晋献侯墓, M9 组不可能是晋侯燹父及其夫人的墓葬, M102 晚于 M93,基本同意第五次发掘简报的意见^[54]。冯时同意 M63 杨姑为晋侯邦父夫人,认为传世盨铭叔邦父与叔姑就是北赵墓地晋器中的晋侯邦父与杨姑,藉、稣当为本字,分别为献侯名、字,传世叔家父簋似为殇叔之器, M64 的两位夫人应以杨姑为正,姜氏盖即 M62 墓主^[55]。江林昌提到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专家的意见基本与第五次简报的墓主排序相同,只是第 8 组的 M93 是文侯还是殇叔意见不一,晋侯墓地体现了公墓与邦墓不相混的原则,晋侯墓地的墓位安排看不出昭穆原则^[56]。孙华认为第五次简报的排序是确切无疑的^[57]。彭林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证实了周代确有公墓和邦墓的区别,昭穆制度是周代宗法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8 位晋侯及其夫人按昭穆之序排列如下: M9、M13(武侯)→M6、M7(成侯)→M1、M2(厉侯)→M32、M33(靖侯)→M8、M31(釐侯)→M91、M92(献侯)→M62、M63、M64(穆侯)→M93、M102(文侯), M9、M13 的左右墓位是殷人遗风,周人的阴阳之位理论成熟于 M9、M13 组之后^[58]。刘克甫认为 M64 墓主为大夫一级的“休”, M64 出“晋叔家父”盘,则 M93 不会是“晋叔家父”之墓,其为文侯一说无任何根据。M1 不一定是“对”的墓葬。M8 不一定是“苏”的墓葬。“北赵墓地即晋侯墓地”之说根本无法成立。北赵墓地应是西周中晚期晋国大夫一级贵族的墓地^[59]。倪德卫、夏含夷认为晋侯苏即晋献侯无疑,推测献侯和穆侯的世系被颠倒,献侯实际在位

年是宣王三十三年到四十三年(公元前 795—公元前 785 年)^[60]。梁云认为 M9 小圆鼎铭文“晋公宗室”应理解为“晋国的公室宗庙”,泛指晋国先君的宗庙^[61]。第六次发掘简报认为按照先前的推定, M9、M13 为晋武侯及其夫人墓,因此如果 M114 早于 M9,则 M114、M113 组墓就应当属于晋侯燹父及其夫人,反之,如果 M114 晚于 M9,则 M114、M113 就应当是晋武侯及其夫人墓,而 M9、M13 则属于晋侯燹父及其夫人^[62]。孙庆伟认为晋侯燹父可称“晋公”,晋武侯因随周王出巡并受周王赏赐而为其父晋公燹父宗室作器,出晋公宗室鼎的 M9 应是武侯之墓,而 M114 则是燹父之墓^[63]。李伯谦认为出晋公鼎铭文铜器的 M9 应是晋武侯宁族之墓,同意 M114 组早于 M9 组,认为 M114 组属西周早期晚段,约在昭王前后, M9 组、M6 组属西周中期早段,约在穆、恭、懿三王之世, M33 组属西周中期晚段,约当孝、夷至厉王早期, M91 组、M1 组属西周晚期早段,约在厉王、共和时期,下限或至宣王初年, M8 组、M64 组属西周晚期晚段,约在宣王时期, M93 组时代最晚,下限已至春秋,约在幽王、平王之世, 9 组晋侯及夫人墓是连续发展下来的,中间并无断缺^[64]。李伯谦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除了将 M113、M114 组放到最前面的早期位置上外,其余排序与前相同,认为 M114 组属西周早期晚段,约在昭王前后等等^[65]。刘克甫认为北赵墓地非晋侯墓地,而是晋国大夫一级的静谧之处,他指出研究者根据铜器铭文确定墓主的标准不一,对《史记·晋世家》中的晋侯世系提出异议,并认为简报作者提到晋侯世系与墓地状况不完全符合,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指出讨论学术问题所用方法应该严谨,不应该有成见^[66]。张长寿认为各组墓的排序为: M9、M13→M114、M113→M1、M2→M6、M7→M8、M31→M33、M32→M91、M92→M64、M62、M63→M93、M102,并指出从晋侯墓地出土的铜器来说,最明显的变化应在 M9 组、M114 组和其后的各墓组之间,其年代或在西周中期偏早时期^[67]。许杰通过分析认为晋侯邦父所在的 M64 早于晋侯苏(M8)和晋侯对(M1),而 M8 和 M1 的早晚尚难以确定。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一个方法论上的原则,即晋侯墓地早晚序列的年代单元应该是墓而不是组,并讨论了晋侯墓地陶器在断代排序上的局限性^[68]。侯毅认为简报作者的排序是比较客观的,并认为 M114 组早于 M9 组^[69]。田建文、谢尧亭认为 M113、M114 组早于 M9、M13 组, M114 墓主人即为燹父, M113 为其夫

人。并认为晋侯墓地的墓位安排方面昭穆制度全然不见。M33 为晋厉侯的墓，M91 为晋靖侯宜臼，M1 为晋釐侯司徒。M92 晚于 M91，M64 不是穆侯墓而是晋文侯墓，M64 组为文侯仇及夫人，M63 为晋姜墓，M93 组为晋昭侯及夫人墓，晋穆侯之墓与晋侯斯之墓可以着眼于 M113、M114 组和 M91、M92 组之间的墓葬和车马坑^[70]。张懋镕认为 M114 组（以 M114 为主）的年代稍早于 M9 组年代，其他墓葬的排序与第五次发掘简报相同，并指出墓地中没有唐叔虞的墓葬^[71]。黄盛璋认为 M114 墓主为晋侯燮父之墓^[72]。朱凤翰提出两条原则，进而安排出两种可能：一、M114 是燮父墓，M9 是武侯宁族墓，M6 是成侯服人墓，M33 是晋厉侯福，即铭文燮马，M91 是靖侯宜臼，即铭文喜父就是对。二、M114 为武侯宁族，M9 为成侯服人，M6 为厉侯福，M33 墓主是晋侯喜父，亦即晋侯燮马，M91 为晋靖侯宜臼，即铭文对^[73]。张懋镕认为 M114 组墓葬年代早于 M9 组，M114 早于 M113，其余墓葬排序与第五、六次发掘简报相同^[74]。王占奎通过 M9 铜器铭文中“晋公”认为 M114 为燮父墓，M9 为晋武侯墓^[75]。田建文也认为 M114 组早于 M9 组，M114 的墓主即燮父，M113 为其夫人，并认为晋侯墓地其墓位的安排上，昭穆制度全然不见^[76]。孙庆伟也认为 M114 组墓葬早于 M9 组墓葬，M114 时代在昭王时期，M113 年代略晚，而早于 M13，M9 是晋武侯之墓^[77]。宋建认为 M114 组是最早的一组墓，很可能是晋侯燮父夫妇的墓葬，M93 组两座墓年代最晚，M93 墓主人是殇叔的可能性最大^[78]。黄盛璋认为叔矢为 M114 墓主，M114 为晋侯，M113 为其夫人，M114 年代世次最早，为晋侯墓地的始发墓，M114 组早于 M9 组的年代、世次，M9 是武侯墓，并认为墓地墓葬只有二排，根本不是按左昭右穆的次序埋葬，M114 位于北南两排墓之间的最东部正中位置，合于《周礼》^[79]。黄锡全认为晋侯墓地应是南北三排，M114 和 M91 之间可能有一更早的晋侯墓被现代建筑所破坏，此假设若属实，则其墓主可能是唐叔虞，文侯及以后的晋侯应葬在另一未发现的墓地。M93 有可能为殇叔的墓葬，葬在诸侯墓地之外，其余除 M114 组为燮父外与第五次简报排序相同^[80]。孙庆伟认为 M114 为燮父之墓，M9 为武侯之墓^[81]。何琳仪认为 M8 出土的簋、壶上的晋侯名字左旁为曲字，排列晋侯墓主与《史记·晋世家》的对应关系如下，M？（叔矢）为唐叔虞，M114 为燮父，M9 为武侯，M6（燮马）为成侯，M33（喜父）为厉侯，

M91（对）为靖侯，M1（斨）为釐侯，M8（苏）为献侯，M64（邦父）为穆侯，M93 为文侯^[82]。陈松长认为张颢和裘锡圭的 M8 青铜簋上晋侯名字的隶定是正确的，并将其理解为“所”字，认为“所”和“苏”双声叠韵，解决了同墓随葬青铜器中有两个晋侯名的矛盾^[83]。王世民通过随葬编钟的研究认为有学者推测 M93 墓主为晋文侯较为合理^[84]。彭裕商认为 M8 二晋侯名不应是一名一字，晋侯苏是晋穆侯，而 M8 簋、壶铭晋侯才是晋献侯^[85]。汪涛认为 M63 还是应该跟 M64、M62 同组，但 M63 跟 M93 之间肯定有某种关系，也许它们都跟西周晚期的杨国有关系，M63 墓主有可能是 M93 晋侯的生母^[86]。李伯谦认为 M114、M113 组早于 M9、M13 组，是迄今所知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组晋侯及夫人墓，M114、M113 的墓主应是燮父与夫人。M112 为西周中期，居第二排正中，有车马坑，内埋 4 车 8 马，显然不是晋侯及夫人的陪葬墓，墓主身份待研究。其余 13 座陪葬墓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 9 组 19 座晋侯夫妇墓的排序^[87]。任伟认为墓地发掘者对墓位的排列基本可信，9 组晋侯及夫人墓的分布是按时代先后依次排序的，没有昭穆制度的迹象，西周中晚期礼器制度已比较正规，鼎簋的配套使用更是较为严格，一般情况下，鼎簋铭文反映的事物应有关联性，从这个角度考虑，M8 所见晋侯二名应为同一人，考定 M114 为晋侯燮，M93 为文侯仇，《史记·晋世家》所记晋侯的年代大体是可信的^[88]。程平山认为 M63 先为 M64 晋侯的夫人，后又为 M93 晋侯的夫人。M102 墓主人身份属于次夫人或妾，推测 M93 墓主为晋武公（曲沃武公），M64 墓主为晋鄂侯，M114 为成侯，M9 为厉侯，M6 为靖侯，M33 为釐侯，M91 为献侯，M1 为穆侯，M8 为文侯，并认为 M6081 不是唐叔虞的墓葬。同时认为晋侯墓地的排列布局是有规划的，与《周礼·春官宗伯·冢人》所谓的“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有类同之处，与《周礼·春官宗伯·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相符合^[89]。徐伯鸿认为 M93 的“晋叔”极可能是《晋世家》中记述的栾叔宾父。M114、M113 的年代早于 M9、M13，M114 为燮父墓，年代约在昭王前后，M113 为昭穆之际，曲沃晋侯兆域只葬有自燮父至献侯这七代晋侯，M9、M13 为成侯夫妇墓，M1、M2 为厉侯夫妇墓，M6、M7 为靖侯夫妇墓，M33、M32 为釐侯夫妇墓，M8、M31 为献侯夫妇墓，M64、M62、M63 为殇叔夫妇墓，M91、M92 为桓叔夫妇墓，M93、M102 为栾叔宾父夫妇墓。殇叔当为鬻叔，乃邦父号。M91 年代应

在宣幽时期至东周早期,认为穆侯葬于绛无疑^[90]。王恩田认为 M113 与 M114 应是一组具有昭穆关系的晋侯,暂定为第一代晋侯燮父与其弟的墓葬, M9、M13 应是第二代武侯与另一位女性晋侯墓, M7、M6 应是第三代成侯与其兄的墓葬, M32、M33 则应是第四代厉侯与其兄的墓葬, M92、M91 应是第五代靖侯与其兄的墓葬, M2、M1 应是第六代釐侯与其兄的墓葬, M8、M31 是献侯苏与穆侯之墓, M64、M62、M63 分别是文侯、昭侯、孝侯之墓, M93、M102 是哀侯及其夫人墓^[91]。角道亮认为北赵墓地的营造顺序是: M114、113→M9、13→M6、7→M1、2→M33、32→M91、92→M8、31→M64、62→M93、63、102,认为 M64 是曲沃桓叔的墓, M93 是曲沃庄伯的墓^[92]。刘华夏、刘克甫认为周代氏族交换婚制度实亡而名存,标示辈分的“伯”、“仲”、“叔”、“季”字号仍然流行。唐叔虞是武王弟而不是成王弟。M113 所出鼎、鬲之“叔”与“伯”属唐叔虞及其子燮两代, M64 的休之父“叔氏”当即同墓出土方鬲的作器者“叔钊父”,传世鼎上的伯盍父与休为兄弟辈,伯降父鬲的作器者亦然。M93 方壶上的晋叔家父应与文侯仇、殇叔、桓叔同辈。晋侯世系是:唐叔虞(叔虞)→晋侯燮(晋侯)→[畴侯]→武侯宁族(晋侯燮马)→成侯服人(?)→厉侯福(晋侯喜父)→靖侯宜臼(晋侯对)→釐侯司徒(晋侯斯)→献侯籍(晋侯苏、叔钊父)→穆侯费王(晋侯邦父、休、伯盍父、伯降父)→文侯仇、殇叔、桓叔(晋叔家父)→昭侯伯。从唐叔虞始以叔、伯轮流标示辈分不同^[93]。李建生认为 M93 是晋文侯的墓葬, M63 的下葬时间也进入春秋初年,羊舍 M1、M2 可能是成师及其夫人的墓葬^[94]。

评 1.正如李伯谦等所言,晋侯墓地未实行文献所谓的昭穆制度,其实昭穆制度在史学界是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95],所谓的昭穆制度在西周墓地是否存在,若存在反映在墓地埋葬顺序上究竟是怎样的形式,值得深入研究。2.研究晋侯墓地的年代和排序受到制约的客观因素有:资料刊布有限,器铭仅有“苏”可与文献直接对应,由于方法和技术上的问题,碳 14 确定的绝对年代的可靠性多被怀疑。3.有些作者据文献所载昭穆制度的顺序等与晋侯墓地进行套合,削足适履,殊不足据。4.有些作者在论证墓主的归属和墓葬排序上,并没有综合考虑相关的各种因素,单纯依据自己认为的可能性进行论证,如仅据陶鬲、铜鼎等进行排序,且不说它们属于不同类型,仅以这种简单的排序得到的结论自然是不可靠

的,无疑这么做的结果是陷入猜谜的泥淖。5.应该承认晋侯墓地 19 座墓葬都存在着早晚之别,正如许杰所说的应该以墓葬而不是以墓组为年代单元进行研究。6.刘克甫的某些意见虽然未必正确,但引人深思,因为他指出了一些论证方法上的问题。7.位于墓地中部的 M112 及其他新发现的墓葬应该引起注意,可惜资料刊布太少。8.晋侯名和字的解释并无不可,像“对”、“喜父”、“燮马”与文献也难以直接对应,但为什么晋侯铜器既称名又称字?像 M8 出现二晋侯名字,其他各组墓却未见一名一字晋侯铜器铭文,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二、关于晋国的迁都问题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邹衡就认为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主要是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遗址,指出若以实物来核准,则只有故翼城和坊堆—永凝东堡二址值得再研究,其他诸地皆不可能为早期的晋都,天马—曲村遗址和苇沟—北寿城遗址的发现,自然就为寻找晋国的旧都——“故绛”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认为霍山以南、绛山以北、汾水以东、浍水以西方圆百数十里的范围内,很有可能就是《晋世家》所谓“方百里”的晋始封之地^[96]。晋侯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在结语中认为,天马—曲村遗址和周初晋国始封地有着密切的关系。邹衡教授曾根据遗址的规模、内涵推测这里是晋国早期国都所在,西周大墓的发现为这一推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97]。李伯谦认为晋国在西周时期不曾迁都,认为天马—曲村遗址既是唐,又是翼,而不是故绛,不是曲沃,不是燮父徙居的晋^[98]。第二次发掘简报认为本次发掘,确定了西周早中期之际至春秋早期晋侯墓地就在天马—曲村遗址之中,这就以确凿的实物资料,证明了这一时期晋国都邑必在此遗址附近,从而为探索晋国始封地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99]。邹衡《论早期晋都》中重申:“我曾以为此(指天马—曲村遗址—本文作者注)乃晋故都之绛地,也是晋始封之唐地,可是缺乏确证”,1992 年春、冬的发掘“确证天马—曲村遗址为早期晋都”,认为“天马—曲村遗址应该就是唐叔虞始封之地”。“晋自叔虞封唐,至孝侯徙翼十二侯,又武公代晋至景公迁新田九公,历时共 370 余年,皆立都于绛,即史学家所称之故绛,亦即今翼城县与曲沃县交界处之天马—曲村遗址”。同时认为“晋之翼地即今故城村”^[100]。刘绪提出天马—曲村遗址作为晋都的终止,有可能就是穆侯迁绛而导致的^[101]。田建

文认为唐与故绛绝非一地,翼与故绛乃同地,进而指出翼城的苇沟—北寿城的西周时期城址可考虑,而唐地不明^[102]。刘绪、罗新基本赞同邹衡和李伯谦的意见,同时提出穆侯迁绛之说还是可以成立的^[103]。邹衡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为叔虞始封地唐,但并非把晋之始封地仅仅局限于此,至少可见其范围并不太大,西周初期的晋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翼城、曲沃二县境内,又比较集中在翼城县的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河以东,浍河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以南,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广约15公里的长形地带,在此范围之内大概也就是晋始封地的中心所在^[104]。邹衡在1998年强调指出天马—一曲村遗址应该就是晋国的绛都,亦即故绛都,不管怎样,这是晋侯墓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是早期晋都也是没有问题的^[105]。谢尧亭指出北赵晋侯墓地所在之都的几种可能:是翼或早于翼的另一都,唐或在他处,天马—一曲村遗址不是故绛,并提出晋至少应有三都,最多不过五都^[106]。江林昌认为唐叔虞封在唐地,其子燹父虽改国号为晋,并无迁都之事,直到晋靖侯,其地均在唐地,今武侯至文侯前后相承的八位晋侯墓地均在天马—一曲村遗址内,则此地为唐叔虞始封的夏墟,亦即《诗·唐风》最初地望所在,已确凿无疑。《扬之水》中的曲沃正是晋侯墓地的所在地,唐国的旧都^[107]。陶正刚认为晋国早期都城“唐”应该是在天马—一曲村遗址附近,霍山以南的洪洞、临汾、翼城、曲沃、新绛等地,应该是唐国的疆域^[108]。刘克甫同意晋自叔虞至孝侯迁翼皆立都于天马—一曲村遗址一带的结论^[109]。陈继荣认为晋国始封的唐地位于“桐”地,在今闻喜东北附近,而非前人所说其他诸地,燹父由唐迁晋、成侯由晋迁曲沃、穆侯再次由晋迁绛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110]。田建文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不可能是故绛,但故绛离该地不会太远,并认为文侯之后晋国不曾迁都^[111]。李伯谦强调晋侯墓地的发现确证天马—一曲村遗址即晋国始封的唐地,所谓由唐迁晋、成侯迁曲沃、穆侯迁绛的所谓三次迁都之说都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112]。饶宗颐认为唐叔虞的封地在吉州的鄂^[113]。谢尧亭认为浮山、临汾、翼城和洪洞一带倒极有可能是唐国故地,指出故绛在今天马—一曲村遗址实不可据^[114]。王立新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非绛,非翼,非唐,没有确切依据,穆侯迁绛之说是难以排除的,进而认为苇沟—北寿城遗址作为晋都故绛的可能不能排除,认为邹衡的翼都故城村说颇有道理,认为洪洞县的坊堆和永凝东堡一带应

继续开展工作,可能会对解决唐地所在有帮助。他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的性质应为燹父所迁的晋,并指出M6081可能不是叔虞之墓^[115]。任伟认为文献记载晋都诸说中似平阳说与翼城说较为切合历史实际,天马—一曲村一带是否就是晋国的始封地,还难以最后落实,唐叔子燹是否迁都于晋目前也还难以落实,由唐迁晋水旁或许是近距离的迁都,所迁的地名为翼,因近晋水而改称晋相比较而言较为合理。成侯迁曲沃说与穆侯迁绛说不足为信,昭侯以下徙翼之说应是对《史记》索隐的臆测,认为苇沟—北寿城遗址可能就是故绛所在,翼在天马—一曲村,翼与绛非一地^[116]。程平山也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应当是唐叔虞始封的唐^[117]。徐伯鸿认为晋侯燹父及晋武侯居晋,其墓却葬在曲沃,推测曲沃墓地当是燹父选定的公室兆域,支持成侯迁曲沃和穆侯迁绛说^[118]。马保春认为天马—一曲村只能是晋国一处包括晋侯及其夫人、晋国人的墓葬区,似乎不能与晋都划等号,唐地仍然没有找到,燹父都晋,成侯自晋所徙曲沃可能在绛山北麓,穆侯自曲沃徙绛,即故绛,故绛或即晋,曲沃武公时期可能南徙今闻喜的曲沃,武公灭翼,初都曲沃,旋即自曲沃又徙都绛,直到公元前585年迁都新田^[119]。孙庆伟认为古唐国之都在鄂,叔虞封唐之后也都于鄂,把天马—一曲村遗址看作唐还是晋都是不妥当的,晋侯燹父都向^[120]。

评 1. 早期晋都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晋侯墓地的发现而得到彻底解决,由于与墓地相关的都城并没有确定,唐、晋、翼、故绛的所在地仍存在较大争议。2. 唐地是一个区域概念,唐都鄂地在哪里与唐遗存的发现与确认密切相关。3. 与晋侯墓地相对应的都城在哪里?是不是天马—一曲村遗址?若是,相关的城垣、宫殿、作坊、宗庙等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考古工作予以解决。4. 新见甗公簋^[121]如果不伪的话,则燹父徙都之事可得到证实。成侯迁曲沃很可能是成师迁居曲沃的误传,将成师误作成侯。5. 羊舍墓地^[122]的发现为研究晋都的变迁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可惜被盗,资料也刊布太少。6. 相关的考古工作的开展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曲沃县天马—一曲村遗址、翼城县苇沟—北寿城遗址、翼城县故城遗址、洪洞县永凝堡遗址等都有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必要。7. 近年来绛县侗国墓地和翼城县大河口墓地的发现,无疑对于进一步确定西周时期晋国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待续)